序

胡鞍钢

1978年以来，经济一直高速增长的中国，因为金融部门改革的滞后，而产生了渐进式改革次序与其他国家巨大的发展差异。这一现象被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麦金农教授称为市场化改革的“中国之谜”。渐进改革过程中，金融业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我们一直关注的问题。1989年，世界银行在1978年金融体系改革报告之后，又出版了金融发展报告，对世界各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提供了各国金融发展的政策选择。报告强调：“在金融与发展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联系”（世界银行：[illegible]）。可见，金融部门在一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当前，中国的改革正在“过大关”，解决金融问题是关键所在。由于中国改革过程中长期只重视“汲取金融”，忽视“建设金融”，使得中国金融问题十分突出，化解风险、提高效率，已是当务之急。1978年以来，面临经济发展初期的资金约束，中国金融业以“输血者”（或曰“钱袋子”）的角色出现在改革进程中。“投资饥渴症”产生了对金融资源持续不断的需求，使金融业始终没能摆脱“钱袋子”的角色定位，并因此被赋予了大量的行政性职能。虽然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步步棋活”、“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但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却大大偏离了这一目标。1978年以来，金融市场只是适应筹资需要而有所发展。转轨时期资金计划供给制的特征使企业一直具有“免费资本幻觉”，这一幻觉由信贷市场一直延伸到资本市场，使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股份制改造变成了国企“圈钱”、“脱困”的工具。这样，整个金融市场就变成了各级政府的“钱袋子”，在中央财政收入比重连年下降的背景下通过巨额“铸币税”收入和获取“金融剩余”，使金融业替代了财政和税收制度的功能，支付了中国改革的成本，造就了“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与高金融增长”的市场化次序的“中国之谜”。由于整个改革过程呈现出“企业领着金融走”的明显特征，使得金融市场只能被动适应企业融资需要，无法发挥金融业在经济增长中主导配置资源，进行风险管理、监督企业运行、传递经济信息等多种功能，导致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的发展深度远远不足，金融安全问题十分突出。金融发展问题成为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的重大隐患。

迫切需要科学研究指导的中国金融改革实践，需要深入的金融研究成果。周立博士对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适应了这一需要。周立博士的研究跨越了整个中国改革历程（[illegible]），涵盖中国各个地区，并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将为中国解决金融发展问题提供基础性研究的贡献，也将为中国的经济金融改革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

我们知道，在金融研究方面，把整个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做出的成果已非常多，但深入到中国各地区的研究成果却非常少。在研究的期间上，进行短期的适应性改革的研究成果非常多，而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长期研究成果却非常少。由此可见，周立博士对[illegible]年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就显得十分有意义。

在我个人多年的中国国情研究过程中，一个突出的体会是：除开港、澳、台制度不同的地区外，大陆地区在大一统的表面下，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差异极大，经济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层面，其间的差距和悬殊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就金融国情而言，各地金融发展水平不一，金融业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不一，金融安全问题表现不一，百态纷呈。因此，金融研究就不能简单地把中国这一广大的地域看作一个整体。

周立博士[illegible]年进入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

站工作以来，一直与我合作，从事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收集整理了中国各地的大量数据，提出了不同的研究方案，并最终确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下，课题研究循序推进，经年不止。

[illegible]年源月，受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金融工作会议专家咨询会”之邀，我们提交了“加强政府治理，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咨询报告。[illegible]年缘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邀请我参加“中国金融部门改革”研讨会，周立博士和我共同商议论文的结构，并最终形成了“中国金融发展地区差距”的实证研究论文。怨月份我赴美参加在哈佛大学举办的研讨会，得到了与会专家的充分关注。[illegible]年，周立博士的相关研究报告还进一步提交给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香港浸会大学“浸会—清华”学术论坛和亚洲研究网络（[illegible]马尼拉）等机构和相关学术会议，提供了决策支持和知识咨询，产生良多社会影响。[illegible]年怨月，周立博士提交了[illegible]万字的《金融与发展：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illegible]》的研究报告，得到了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清华大学十多位专家的肯定。报告被评议为“优秀”。

现在，周立博士在近几年潜心研究基础上，完成了《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illegible]》一书的写作，并作为专门著述交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欣然作序，并祝周立博士在今后能为中国经济、金融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决策知识。

胡鞍钢

[illegible]年猿月[illegible]日

第 员章摇导摇论

摇摇摇金融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是经济市场化次序的“中国之谜”，如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既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作用的已有研究显示，金融改革深化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经验验证。本书对中国各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促进这一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入，也为中国的经济、金融发展实践提供基本政策参考。选取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将便于我们揭示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员窑员 摇 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是人类福利增进、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发现经济增长的源泉，并采取措施释放生产力，是人们一直探究的问题。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增长率却大不相同，对此如何做出解释，是人们寻找经济增长源泉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对此，已经有大量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努力做出解释。这些解释包括要素的积累、资源的配置、技术进步、宏观经济稳定、教育水平、制度发展、法律有效性、国际贸易，甚至宗教信仰的差异

等等①。不仅如此，种种新的解释还在继续提出，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挖掘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近些年，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普遍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许多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研究②表明，金融深化③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国经济发达程度越高，其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也就越高，这种经验联系几乎毫无例外。这些研究隐含了如下意义：努力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滞后，将不利于经济增长；而多个国家相继爆发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显示，不合适的金融发展，将导致金融危机，不仅使数十年的经济增长成果毁于一旦，还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甚至政治危机。事实上，许多国家也都将金融发展作为促进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将金融改革作为其经济市场化的核心步骤，将金融安全作为其维持社会稳定和政权合法性的根本保障。

[illegible]年以来，经济一直高增长的中国，因其渐进式改革次序与其他国家迥异，而被称为市场化改革的“中国之谜”（[illegible]）。在金融制度改革与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的同时，又取得金融资源的高增长，是这一改革的一大特色（周立，[illegible]）。但是，面对国际上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和国内金融问题的渐次显露，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 中国经济长期高增长过程中，金融业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何评价其作用？
- 中国的市场化次序为何会与其他转轨国家截然不同？金融改革何以滞后？

---

① 见[illegible]。一开始，经济学家们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如下一些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生产资料等，后来由内生经济学家们扩展到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技术进步等，再后来，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考虑了更多的制度文化因素。总之，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探究没有终止。

② 见[illegible]及[illegible]的综述。

③ 指金融市场量的扩张和质的改善，衡量指标不一。本书也主要用金融深化程度衡量金融发展。见本章注[illegible]和[illegible]章的变量解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中国金融业为何会呈现出长期“高增长”与长期“低效率”并存的特征？这种金融发展路径能否持续下去？

➢ 金融业在经济发展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政府和市场在金融发展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的情况怎样？

➢ 政府主导下的中国金融发展，能否适应建立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若不能，应如何改革？

这些问题已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中国社会能否保持长治久安，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研究并解决这些问题，在目前改革的攻坚阶段，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针对上述重大问题，本书将从理论上解释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从实证上检验 [illegible] 年期间中国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经验。① 并从金融资产等多个角度衡量二十多年来中国发展的状况，做出评价及机制分析。由此为中国进一步的经济金融改革提供政策参考。

[illegible] 理论准备

[illegible] 世界上关于中国金融发展状况的研究

[illegible] 在过去几十年，对于金融业的功能与作用，已有大量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些经济学家，如格利和肖（[illegible]），戈德史密斯（[illegible]），麦金农（[illegible]）等，将金融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根据他们的观点，金融服务的数量和

① 由于对于中国经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类同于跨国研究，对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将进一步丰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新的经验证据。见胡鞍钢等（[illegible]），林毅夫等（[illegible]），蔡[illegible]等（[illegible]）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做的研究；周立、胡鞍钢（[illegible]）对于中国金融发展地区差距做的研究。再就是（[illegible]）的研究也表明，[illegible] 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导致了“零碎分割的内部市场和受地方政权控制的封地”（见 [illegible]）。[illegible] 则进一步表明，中国的“省际边界仍像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国界那样阻碍着与外界的贸易往来”，“中国国内市场有走向‘非一体化’的危险”。

质量，可以部分解释经济增长率。他们对于金融结构、金融压制、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分析，使人们开始认识到金融的作用，并深入探讨金融发展的路径。后来的罗斯·莱文（[illegible]）、金（[illegible]）、艾斯利（[illegible]）和德米基·孔特（[illegible]）等一大批内生经济学家，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一步步引向深入。他们的理论，对于研究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遗憾的是，国际上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及转轨经济的国别实证研究成果虽然已有不少，但对于中国全国和地区层面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探讨则比较少，其中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因为中国[illegible]多年来的改革成果太多，世界上对中国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到这一层面；另一方面也因为获取中国地区层面的资料太过困难，难以进行定量研究。世界银行（[illegible]）、亚洲开发银行（[illegible]）、尼古拉斯·拉迪（[illegible]）等对中国金融业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研究中国金融发展问题迫切性的认识，但这些研究还主要着重于金融改革与金融危机的应对层面上，有待于上升到长期金融发展的层面上进行全面的定量研究。

[illegible]摇近些年中国学者的研究

在中国，对于整体金融发展状况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谢平（[illegible]）、易纲（[illegible]）、张杰（[illegible]）、赵志君（[illegible]）等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分析，推动了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深入。胡鞍钢（[illegible]）、王绍光等对中国通货紧缩、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研究，使宏观金融研究与宏观经济研究在方法论上得到了很好的结合。江其务（[illegible]）、樊纲等（[illegible]）对金融发展与企业改革问题的探讨，说明了将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协调进行的必要性。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还是将中国金融业当作一个整体来探讨，没有考虑中国各地区经济金融状况的差异性，研究较少涉及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一层面。

对于中国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状况，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如关于中国区域间的资金配置和流动，唐旭（[illegible]）和贝多广（[illegible]）的研究较早，唐旭研究的样本区间为[illegible]，贝多广研究的样本区间为[illegible]。他们对中国[illegible]世纪[illegible]年代至[illegible]年代初货币资金的区际流动，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可惜作者的研究没有再继续下去。同时，由于当时研究的样本区间较短，使用的统计数据比较零碎，没有形成统一的衡量指标，所以对中国改革以来资金配置的根本特征还有待进一步刻画。谈儒勇（[illegible]）对中国金融发展有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但样本期间也十分短（[illegible]），同时也没有深入到各地区层面。张军洲（[illegible]）和殷德生、肖顺喜（[illegible]）都以“区域金融”分析与研究为题，用了较大的篇幅去探讨地区的金融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但张军洲缺乏对中国各地区金融数据的计算与分析，殷德生等虽收集整理了不少地区金融发展的数据，但没有使用统一的指标和可信的衡量方法。

基于上述，研究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并探讨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成为一件非常有意义并且十分紧迫的事情。

[illegible]摇我们已有的研究

近些年，通过对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数据的整理与分析，我们已经把对中国金融发展①的研究深入到了地区层面。

① 本书将金融发展定义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深化，即一国经济金融化的过程；将金融差距定义为各地金融深化程度的差异。对于金融发展的衡量，戈德史密斯（[illegible]）和麦金农（[illegible]）各提出了一个衡量指标，二者在实际意义上大同小异，主要是衡量金融资产占一国国民收入的比重。二人的指标主要衡量金融资产的数量扩张，并不必然伴随质量改善——金融功能的更好发挥。在后文中，我们将在戈氏和麦氏指标的基础上依据中国各地区金融数据可获得性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造，从而以一个统一的角度系统衡量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并分析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在各地区金融发展的衡量中，我们还做了地区间与国际间的比较，所以又引入了“金融差距”（作为“金融发展地区差距”的简称）这一概念。金融差距分为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两种，前者主要指绝对数量的差异，后者指相对水平的差异。在进行各地区比较时，我们将较多地使用相对差距，而在进行国际比较和政策分析时，我们将会对一些绝对差距进行比较。

我们计算了各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及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分析其路径与影响。我们已有的研究（周立 [illegible]；周立、胡鞍钢 [illegible]；周立、王子明 [illegible]）已经揭示出：

（1）政府过度介入导致了金融条块分割。中国中央政府在中央财政能力下降后，推行了纵向分割式的金融改革；地方政府在投融资体制改革（拨改贷）后，强化了横向分割式的金融控制。由此，导致了中国各地区金融资源的条块分割，无法形成金融资源在地区间和行业间的有效配置。

（2）市场开放不足导致金融竞争力低下。中国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均不足，使得中国的金融发展与改革完全处于政府掌控之下，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金融业竞争能力低下。

（3）金融业已经异化为“第二财政”。政府对金融业的过度介入，导致金融资源被异化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金融业异化为“第二财政”，[illegible]年代中期起，国有银行发挥的财政平衡功能甚至超过了财政本身。

（4）现有金融改革与发展路径已经陷入僵局。由于中国[illegible]多年的金融改革本质上只是金融分割，金融发展本质上只是金融增长，金融业扮演的角色本质上只是政府的“钱袋子”，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推进，本质上以拖延金融改革与发展为代价。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和开放，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已经陷入僵局。中国改革的根本目标——建立有效率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成。

而且，通过对经济发展差距和金融发展差距的计算和观察（周立、胡鞍钢 [illegible]），我们已得出两点重要结论：

（1）由于中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显著，对中国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国家层面，只有深入到地区层面，才可能把握到基本的现实，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研究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中国地区间经济金融差距的分析，已类同于跨国研究。

（2）经济差距和金融差距的变动趋势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偶然的呢，还是必然的？这种一致性是通过什么样的关系产生的，它与国际上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有何

联系？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各地区的层面去研究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摇摇 问题如何解决

摇摇摇摇摇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摇摇但是，从哪个角度去探究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呢？我们选取了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角度。无疑，金融发展受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的影响。落后国家的金融发展过程，一般有着明显的政府过度介入特征，其金融发展主要依赖于政府推动。政府之所以有动力推动金融发展，主要基于三个原因：

(员) 发展金融业，可以更有效地动员储蓄，从而获得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资源——资金；

(圆) 发展并控制金融业，可以利用资金的高度流动性，主导资源配置，增强政府能力；

(猿) 金融业提供的便利交易、风险管理、公司监督、信用保证等功能，可以大大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

但是，落后国家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市场化的过程。由于金融业从本质上不属于公共物品，由政府主导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可能长期持续。于是，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过程，本身就应当是政府的不断退出和市场的不断进入过程。同时，由于金融业巨大的外部性以及控制金融业的巨大收益，又使政府既不能够，也不愿意从金融发展中退出，从而，就产生了金融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矛盾冲突，两种力量的升降变化，决定了一国金融发展的方向和水平。

无疑，中国金融业具有政府过度介入的典型特征，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金融业市场化步伐加快，金融竞争加剧。但是，中国的金融发展过程，是否呈现了市场不断进入和政府不断退出的特征呢？作为分权改革的两大主角——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在金融发展中，各自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过程与原因如何？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出回答。

基于上述，本书选取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对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机制进行分析（见图 员-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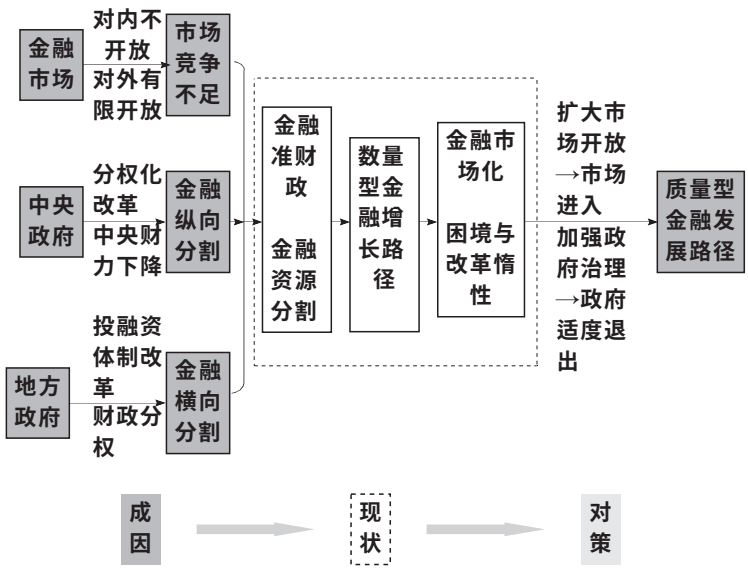


图 员-员 中国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在图 员-员的总体分析框架下，本书将首先分析中国金融发展的成因与现状，以此为基础，再进一步探讨中国由数量型金融发展向质量型金融发展转变的政策建议。我们的分析是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角度做出的。从政府角度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分权化改革后，就相继介入了金融发展。伴随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分割金融机构，强化了金融机构的“税收征敛”和“替代中央财政”职能；地方政府在以“拨改贷”为标志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后，也加强了对当地金融机构的控制，强化了金融资源的地区分割和金融机构“替代地方财政”的职能。从市场角度看，由于政府主导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市场竞争一直是不充分的，金融业对内不开放，对外有限开放，导致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融业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和效率意识。政府过度介入和市场竞争不足,导致了中国金融业呈现出“第二财政”或曰“准财政”的明显特征,走上了“高增长、低效率”的数量增长型发展路径。对这种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使中国的金融改革具有惰性,金融市场化改革陷入困境。必须着手进行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改革,才能使中国的金融发展走上有效竞争、追求效率的质量提高型发展路径。

员愿援摇政策建议框架

在现代经济中,金融发展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条件。金融发展环节和次序是不容忽视或省略的。没有高质量的金融发展,就没有持续稳定协调的经济增长。基于上述,在对中国实践进行长时期的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需要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本书的政策建议框架仍从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角度着手:要打破中国金融市场化和开放的僵局,克服改革的惰性,必须依赖第三方力量的引入。这一方面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引入市场竞争主体,促进市场功能的恢复;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治理,重塑政府功能,使政府从金融发展的过度介入中适度退出,解除金融机构的政策性负担,同时也就破除了金融机构的政策性依赖。以此促进金融功能的重建,走上质量型金融发展路径。

质量型的金融发展将是金融功能的全面发挥。主要是动员储蓄、配置资源和便利交易这三大功能的发挥。由于中国“高增长、低质量”的数量型发展路径是在政府主导下由政府越位和市场缺位造成的。促进政府由越位到归位,促进市场由缺位到到位,才能促使中国金融发展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高型转变。政策建议框架如图员-圆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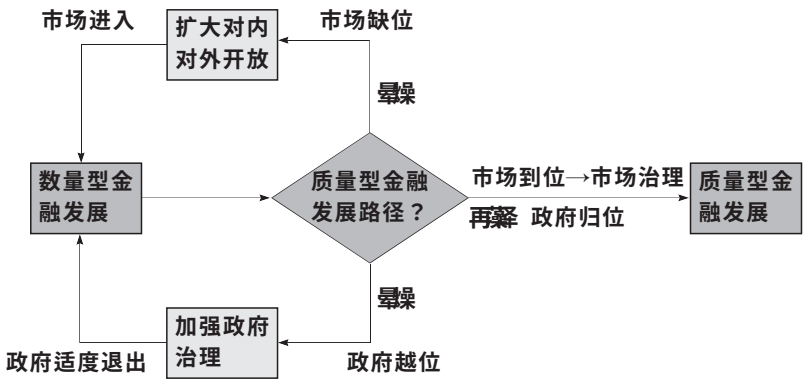


图 员-圆 中国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框架

员.猿 研究方法、资料来源及研究进程

员.猿.员 研究方法

（员）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了数量分析、调查访谈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数量分析为主。

在数量分析上，本书将主要对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做出实证分析，以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联系。为验证数据分析的可靠性，本书使用了三种检验方法：

第一，相关分析。对回归分析结果进行统计检验。

第二，人物访谈。访谈对象为三种人物：分别是金融监管当局的官员；各地区金融部门干部职工；国内外有关学者。

第三，案例调查与分析。我们将以地区层面的实地调研，来检验数量分析的结论和补充数量分析的不足。

（圆）数量分析中使用的指标

数量分析采用的分析指标有两类，一类为金融发展指标，另一类为金融结构指标。

金融发展指标将依照国际上通用的戈德史密斯和麦金农的指标，以金融资产占[illegible]的比重来衡量。限于中国各地区金融资产

的数据可得条件，将利用存贷款的数据作为金融资产的一个窄的衡量指标，去揭示中国金融发展水平。本书将主要利用 [illegible]年的国有银行存贷款数据，来反映地区间金融资产的配置状况，使其能从总体上衡量一个地区的金融深化水平，并利用 [illegible]年所有金融机构存贷款衡量的金融相关比率做出补充，以反映金融资产分化后各地区金融发展的实际水平。

金融结构指标将分析金融资产的内部结构。其中，使用的指标有收入比、存贷差和存贷比。

同时，本书还将使用产值、人员、机构等作为辅助金融指标，衡量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

[illegible]资料来源

([illegible] 数据资料来源

本项目的样本数据包括：[illegible]年中国各省区 [illegible]存款、贷款、物价指数、股票和债券发行量、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人口、利率变化等。

[illegible]年中国各地区 [illegible]国有银行存贷款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illegible]年数据)、《中国统计年鉴》([illegible]年)、《中国金融年鉴》([illegible]年)，其中[illegible]和 [illegible]年国有银行存贷款根据统计规律推算，对于数据中极少一部分数字因印刷错误或统计口径变化的情况，则依据各省市区相关年份统计年鉴、《改革开放十七年来的中国各地区经济》和《中国金融统计》([illegible]及《中国金融统计》([illegible]做出订正(订正方法见第二章)。物价指数、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人口等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股票和债券发行量、利率变化等数据来自《中国金融年鉴》([illegible]。由于系列数据主要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统计年度较长([illegible]年各地区 [illegible]存贷款数据均取自此年鉴)，口径一致，所以数据可信度很高。

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数据根据《中国金融年鉴》([illegible]“各地经济金融篇”摘出。对于少量缺失或印刷错误的数据，依据统计规律做了修补与订正，订正依据是相关年份该地区统

计年鉴、《改革开放十七年来的中国各地区经济》和《中国金融统计》（□□□□—□□□□）及《中国金融统计》（□□□□—□□□□）等统计资料。由于《中国金融年鉴》中所载的部分地区间和年份间统计口径不尽一致，故数据的质量对分析有所限制。但由于我们不是直接依照各地区的存贷款数据与□□□□的比率，而是将比率进一步指数化，最后利用指数来进行实证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原始数据误差对最终结果的影响。而且，由于各地区□□年来统计数据口径的变化基本同步，因此在做跨地区的趋势比较分析时，利用这些数据具有解释力。

由于中国各地区人口规模迥异，本书将主要使用人均数、相对比率和加权数进行地区间比较，这样可以消除人口规模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调查与访谈资料来源

本项目所做的案例调查与分析，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年□月做出的广东东莞市金融调查，在中国人民银行东莞中心支行的协助下，重点调查了中国人民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东莞分行，写出了《当前应如何处理政银企关系》的调查报告。

第二次是□□□□年□月对江西赣州市和兴国县做的金融形势问卷调查和访谈。在赣州市政府和兴国县政府安排下，对赣州市各部门的□□位干部做了问卷调查，并对赣州市和兴国县经济计划部门、人民银行有关官员做了座谈。写出了《地方干部如何看待当前金融形势》的调查报告。

第三次是□□□□年□月做出的广东东莞、惠州、梅州三地农村金融调查。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协助下，对上述三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村级组织和村民做了系统的调查与访谈。写作了《三类地区、三类问题、三种对策》的农村金融需求与供给调查报告。

调查过程中，我们对当地的政府官员、金融部门负责人和员工、农民、村干部等做了访谈。除此之外，还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有关学者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国家开发

银行、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一些研究人员做了访谈，并获得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建议。[illegible]年 源–苑月在法国访问期间，我还对法国财政部、法国社会科学院、巴黎第一大学、巴黎第五大学、巴黎政治科学院的有关官员与学者做了关于中国经济金融转轨和俄罗斯及部分东欧国家比较的访谈。

猿[illegible]研究过程

本书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illegible]年 员苑月至 [illegible]年 猿月），收集并分析关于本书的全套数据。与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金融年鉴出版社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统计部门联系，收集《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当局发布的统计资料。

第二阶段（[illegible]年 源月至 员[illegible]月），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写出初步研究报告，提交有关会议和专家审阅，以便完善数据库与分析方法，提炼研究的精髓。同时，开展访谈和调查研究，以检验和补充计算结果。

第三阶段（[illegible]年 员月至 员苑月），撰写以该项目为内容的后研究报告，并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进行成果鉴定，同时根据这些专家的意见与建议修改完善报告，完成项目专著的出版。

员[illegible]摇本书结构与结论

员[illegible]本书结构

本书共导论一章、正文七章，并附有 苑个调研与数据附录。各章内容安排如下：

第 员章导论提出问题，并介绍问题的解决方法和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 [illegible]章为理论研究。主要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文献进行回顾，为本书的研究提供理论准备。

第 猿章实证分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实证检验 员[illegible]–[illegible]年期间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 源章现状分析。主要从金融资产角度衡量 员[illegible]–[illegible]年

期间各地区金融发展状况。

第 缘章仍为现状分析。主要从人员、机构、产值、资本市场等其他角度衡量 员怨愿怨—圆园园园年期间各地区金融发展状况。

第 远章特征总结。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的总特征。

第 苑章机制分析。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框架下，系统阐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路径，揭示中国金融发展的机制。

第 愿章政策建议。提出调整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系列公共政策建议。

圆郾员 本书主要结论

通过对中国各地区 员怨愿怨—圆园园园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本书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促进金融发展，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但是，通过对各地区金融发展现状的考察，我们发现了中国金融发展的本质特征是金融增长而非金融发展，即是数量增长而非质量提高，或曰“高增长、低效率”。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金融能力的上升是为了弥补财政能力下降的。金融功能的财政化，一方面促进了各级政府、各类金融机构做出金融努力，带来了金融体系和规模的迅速完善与扩张；另一方面导致大量资金被用作政府意愿的用途，带来了金融资源配置的非效率特征。由于政府对金融业的过度介入，已经导致了金融资源被异化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金融业异化为“第二财政”。中国 圆园多年的金融改革本质上只是金融分割，金融发展本质上只是金融增长，金融业扮演的角色本质上是政府的“钱袋子”，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推进，是以拖延金融改革与发展作为代价的，最终必定会影响到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质量。中国金融业需要在稳定中发展，在竞争中成长，走出“高增长、低质量”的数量型发展道路。改革过程中，金融功能对财政功能替代的根源，是政府治理结构的缺陷。只有改变政府治理模式，将政府在财政能力上由缺位变为到位，在金融发展上由越位变为归位，才能真正启动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为扎实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中国金融发展各时期的政府作用可以通过表 员-员表示出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